

明清时期的敦煌

自从一九〇〇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,这座人类文化宝库受到举世瞩目。中外学者纷至沓来,对敦煌遗存(壁画、雕塑、题记、建筑)和藏经洞遗书(敦煌遗书、敦煌卷子)从宗教、艺术、历史、考古、语言等各大面加以研究,形成了以敦煌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——敦煌学,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。纵观这些研究成果,不难发现,研究魏晋、隋唐、五代及宋元时期敦煌的论文、资料很多,而研究明清时期敦煌的成果较少,其中对明清时期敦煌的史地研究更少。因此,笔者试图对明清时期敦煌的建置沿革、地理环境、农业经济、交通及对莫高窟的缮修开凿三个方面作一阐述,目的是想探索明清时期敦煌的实际情况。

一、明清时期敦煌的建置沿革

敦煌,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。“水有悬泉之神,山有鸣沙之异。”“雪山为城,青海为池,鸣沙为环,党河为带,前有阳关而后玉门,控伊西而制漠北,全陕之咽喉,极边之锁钥。”^①自西汉元鼎六年(前110年)在敦煌设立郡治到唐宋,敦煌一直以它的奇异景观、独特文化艺术和交通要冲而被历代所重视。元代末年,位于今敦煌之地的瓜、沙二州被政府内迁,该地渐渐衰落。明代初期,作为西部边陲屏障的敦煌在政府经营西北的过程中发挥过作用。到明朝中后期,随着政府对关外之地舍弃的政策实施,敦煌也就不被重视而逐渐废弃。清朝政府安定了西北边地局势以后,对该地区进行统一管理和规划,敦煌的衰落现象稍有改观。

明代洪武五年(1372年),重修长城,在肃州(今酒泉)以西修筑了嘉峪关自守,并对关西进行了初步开拓。永乐年间,政府在关西设置了七个少数民族机构,史称“关西七卫”(安定、阿端、哈密、曲先、罕东、赤斤蒙古、沙州),目的是利用七卫充当明帝国西陲的“屏藩”,^②沙州(敦煌)是七卫之一。据《明史·西域传》和《敦煌县志》记载:永乐二年(1405年),蒙古部落后裔酋长困即来、买住率领其部众来归,朝廷在敦煌设置沙州卫,授二人为指挥使,赐给他们印诺冠带和裘衣。沙州卫就成了明初在敦煌所设的第一个军政合一的地方机构。但明政府对此没有进行统一管理,既不派官员去督察其内部事务,亦不派军队驻扎,只是替部族人民设置一些水利、农耕设备,并帮助他们在困难时期渡过难关。例如“宣德元年(1426年),困即来以岁荒人困遣使贷谷种百石……寻遣中官张福使其地赍彩币。”^③又“七年又奏旱灾,敕于肃州授粮五百石。”诸如此类的例子《明史·西域传》中还有很多。这说明明朝政府在建国初期对敦煌地区采取的是安抚政策。原因很明确:一是为了使敦煌地区在西部与明王朝保持正常关系;二是为了截断蒙古和西藏的联系,腾出足够的兵力专门对付蒙古族。^④可见,明初敦煌的地位仍然很重要。经过洪武,尤其永乐年间的经营,困即来居住的三十年间,沙州出现了“户口滋息、畜牧富饶”的景象,这“皆朝廷之力。”后来,由于明政府对七卫管理放任自流,处于七卫最西端的敦煌和其它六卫一样,成了边疆部落任意争夺的游牧地。明朝中后期,政府对关西七卫之间的互相争夺和攻伐,采取了“番人相攻,于我何预”的政策,使得当时的敦煌,长期处于哈密和吐鲁番的争夺之下。宣

德十年(1435年),沙州被哈密侵扰,因即来又惧怕瓦剌(蒙古部族,在鞑靼西)。“见逼不能自立,乃率部众二百余人,走附塞下。”“自是不复还沙州,但遥领其众而已。”也就是说,沙州卫于宣德十年东迁了,迁到当时的苦峪地(今安西的东南部约45公里处)。其旧地被罕东左卫所占据。原来,永乐年间,罕东卫的部人庵章与种族不能相容,多次仇杀,就率众逃居到罕东卫与沙州卫相交的东部地区游牧。后来部落日蕃,益不受统属。”沙州久为罕东指挥班麻思结(庵章之子)驻牧,对此朝廷多次敕令他回到罕东卫驻地,思结不从。英宗九年(1444)年,因即来死,二子争立,其一子喃哥密谋投奔瓦剌,甘肃镇将任礼勒兵收其全部,入塞内居于甘州,共二百余户,一千二百三十余人。沙州遂空,思结则乘沙州全部内徙之际,占据了该地。到思结的孙子只克时,吐鲁番强大,侵据哈密。只克为了与吐鲁番相抵抗以免去边地之患,于成化十五年(1479年)请求在沙州故地(敦煌)“立卫赐印,捍御西陲。”得到朝廷准许。于是命只克在沙州故地筑城主罕东左卫,敦煌此时归属于罕东左卫,只克仍以都指挥使统治。正德十一年(1516年),吐鲁番复据哈密,只克之子乞台力不能抵挡,率领其众迁移到肃州(酒泉)境内。他的部下帖木哥、土巴二人占据了沙州并服属了吐鲁番,敦煌从此归属于吐鲁番管辖。吐鲁番势力越来越大,以至于控制了河西走廊,形成了与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封建割据势力。对吐鲁番这样的咄咄逼势,明政府应付无力,只好于嘉靖三年(1524年)正式关闭了嘉峪关,弃关外于不顾。嘉靖七年(1528年)帖木哥、土巴2人因不满吐鲁番的统治,率其部族五千四百人回归关内,敦煌完全被吐鲁番占据,从此进入了吐鲁番统治时期。从沙州卫的设置、更替到最后完全放弃整个过程可以看出,敦煌的地位发生了由重要、次要到完全放弃三个阶段变化,同时亦体现了明朝政府在关外经营方面的态度经历了最初的努力、中期的尽力到最后无可奈何而放弃不顾三个过程。

到了清代,康熙五十四年(1715年),出师征讨叛乱的阿酋,嘉峪关外渐次修复,并在关外设置了赤金、靖逆二卫。^⑧从此处于涣散状态的西北边陲又被重振,敦煌此时亦被清政府从吐鲁番控制下夺回。雍正元年(1723年),清朝在敦煌设置了沙州所(“今按沙州旧城即古敦煌郡治也。”^⑨)属安西同知。三年(1725年)升为沙州卫。就在这一年,党河水猛涨,沙州卫城被党河水侵蚀,东墙坍塌(“今在沙州西,墙垣基址犹存,以党水北冲城墙东圯”^⑩)朝廷便命汪隆负责在党河东岸另筑卫城(明代沙州城在党河西岸与新卫城相对望)。据记载,当时新建卫城的城墙“周三里三分,高一丈九尺六寸,基宽二丈三尺,顶宽一丈,堞墙高五尺。”^⑪规模不小,气势很大。在营建过程中,当地人民踊跃参加,朝廷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。“……给储粮足,力役欢趋喜气盈。”^⑫朝廷对敦煌城的营建能够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,当然与敦煌在西北边陲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分不开的。当时负责修建沙州卫城的汪隆,在卫城告成时以诗表达了清朝重修敦煌城的历史意义。“巩固藩屏依险设,国防士马比云屯。日月野火通蒲海,风接崖纆控玉门。盛世安攘宏缔造,金汤于载纪皇恩。”^⑬可见敦煌在当时不只是起到巩固边防的“屏藩”作用,而且还有保证入藏往来和西域往来的使臣商队等安全通过的作用。^⑭因此,清朝对沙州卫城的修建是十分重视的。沙州卫城,由于受地理条件限制,只开东、西、南三道门,没有北门,规模大小可见今敦煌城(“今敦煌县城筑于旧城之东。”^⑮)。到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时,改置沙州卫为敦煌县,隶属于安西府。二十七年(1762年)时,曾把安西府治移到敦煌县。三十七年(1772年),安西府治由敦煌县移到酒泉县。第二年安西降为直隶州,敦煌县成了它的属下。民国十三年(1914年),安西直隶州改为安西县,这时敦煌县便直属甘肃省所管辖,清朝对敦煌的设置更替和对卫城的重修,可以体现出敦煌在清朝的历史地位是十分重要的。这与清政府对西北地区实行统一规划和管理分不开。

二、明清时期敦煌的地理环境、农业经济和交通

明清时期的敦煌,它的地理条件与唐以前的敦煌相比变化不小,与今天的敦煌相比,在只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后,应稍有不同,但山脉、地势、主要河流、土壤条件、沙丘分布基本变化不大。因此,我们完全可以把时清时期的敦煌与现今的地理条件相互参照来看。

现今的敦煌,地处河西走廊西端,南部的三危山、鸣沙山等,是走廊内部一系列直线形断层隆起的断块山、海拔约一千七百米左右。山南有砾石戈壁和流动的沙丘分布,北部已成为准平原化的基岩戈壁地形,在古老的基岩基础上,覆盖了一层砾石戈壁。中部属走廊地带,党河下游冲积平原是肥沃的敦煌绿洲,海拔约一千一百米左右,疏勒河下游为盐沼。绿洲外围,戈壁与沙丘分布较广。河流和渠水的流向基本是西南流向东北,南流向北,南部和西南部地势高,北部和东北部地势低。党河发源于祁连山脉,在距敦煌城约七十里处,由西北流折向东北流,至敦煌县城附近分流灌溉,形成不规则的冲积扇状灌溉区。

明清时期的敦煌地理形势和现今相比较,可以说是基本相同的。但由于历史和人为的影响,敦煌周围的自然条件,古今有些差异。明初,敦煌自然条件较差。到明代中期,政府积极经营内地,对关外弃而不顾,加上当时人口四次内徙,人户顿减,而留于敦煌屯田的军人,盲目开垦土地,不注意水土保持,以致于流沙日盛一日,明末竟出现了“风摇轻柳空千里,日照流沙别一天”的衰败荒凉情景。只有敦煌绿洲的人们仰仗党河的滋润而艰难地生存着。

清代刚入关时,敦煌的自然条件与明代无任何差别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时期,敦煌的情况与明代有很大不同,由于移民开发,生产不断发展。尤其是雍正年间,一次就迁去今甘肃、宁夏、青海五六州县的移民 2405 户于敦煌。这样大规模的移民,虽使敦煌土地得到开垦,但亦加速了敦煌周围的沙漠化发展。好在当地人民较重视利用党河之水,来发展敦煌农业经济。

敦煌地区,地处党河下游。党河是该地区唯一的重要水源。据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载:“党河古氏置水,水蒙古谓之西拉噶金,出县南山中,两源并导汇为一川。北流迆城西、酳分十数渠,又北入疏勒流,又西潏为哈喇泊,东南有盐池,玉门关、阳关皆县西南。”一九四三年的《重修敦煌县志》记载党河“自南山北流,绕城东西,藉以溉田。”现今的敦煌,党河是唯一大河,发源于祁连山地,流经三百多公里进入敦煌县,河水靠雪融水和雨水补给,流到敦煌县,用于农田灌溉。绿洲之外,全部绝流。

敦煌地区古今水源是相同的。不过明清时期的水势很可能比今天党河的水势大一些,^⑩农田灌溉用水均来源于此。有诗云:“党河分水到十渠,灌溉端资立夏初。不使北流常住海,相期东作各成潏。一泓新涨波浪浅,两岸平排树影疏。最爱春天饶景色,寒水解后网鲜鱼。”^⑪当时敦煌地区人民采取人工渠道分流引水灌溉。党河依靠雪融水和雨水补给,河水流量大小受季节影响较大。因此,当地人民采取储水的办法,一方面保证敦煌的农业不受河西内陆干旱气候的影响,另一方面调节水势分流灌溉。从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,春天的时候,党河流域景色是十分宜人的,河水亦较清澈,泥沙最小,否则就不会出现“寒水解后网鲜鱼”的现象。敦煌人民利用“党河遥通万顷田”^⑫的便利条件,根据本地特点,因地制宜,栽种各种农作物。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有麦、粟、黍、稻、麻、豆、菜,大多种植于敦煌绿洲。在这些作物中,麦、粟、麻、豆、菜,唐代以前就有种植,^⑬而稻、黍清代已经引种,唐代却没有。斯二五九三背《沙州图经》载:敦煌“五谷皆饶,唯无稻黍。”清代时稻子已在党河两岸及灌溉便利之地种植很多了。苏履吉的“间来纵木荒郊外,一阵清风晚稻香。”^⑭是说诗人漫步郊外,追忆敦煌古郡时,一阵阵晚稻之香扑鼻而来。可见当时不但种有稻子、而且根据本地气候种植的是晚稻。同样,唐代所没有的黍,诗人亦提到了

“禾黍谁怀故国伤。”除此之外，敦煌人民还把自地产的皮货、西瓜、良马等送往中原，交换他们所缺的茶、布、丝绸和其它物产。^⑧这种互通有无的作法，大大地促进了敦煌地区的发展。雍正、乾隆年间敦煌出现了“妇子芸芸编户盛，秋成麦熟乐尧天”^⑨的景况。这不能不说是清政府对西北努力经营的结果。

由于敦煌本身的地理条件较差(处于西北内陆地带，风沙又大)，加上人为破坏，周围沙漠化现象愈来愈重。明清时期，尤其清代，经过清朝政府和当地人民努力开发，敦煌的条件有所改观。

敦煌自古以来是中西交通的要道。裴矩在《西域记》中曾说过：“去西域道路有三：即北道、中道、南道。但无论哪一道，都是“发自敦煌。”因此他说：“总凑敦煌，是其咽喉之地。”敦煌地位的重要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明代初期敦煌仍是通往西域的一条重要道路。洪武年间，太祖努力经营河西地区和更西边，《太祖实录》载：洪武十三年(1381年)七月，甘肃都督濮英军拓地，直到甘肃西边关外的苦峪，洪武二十四年(1392年)又征伐到哈密，这次征略，虽未到敦煌及其西部，但为明代打开西域之门奠定了基础。永乐初，通往西域的大道被凿通，敦煌在这条道路上仍起着它的转间站作用。^⑩嘉峪关外，有经沙州(今甘肃敦煌县西)、哈密(今新疆哈密市)、吐鲁番等地，通往若先(今新疆库车县)、阿速(今新疆阿克苏)、克力宾(今新疆柯宾县)、喀什哈力(今新疆喀什布)、我撒刺(今新疆乌恰县西北)、俺的汗(今苏联安集延)、撒马儿汗(今苏联撒马儿汗)等欧亚诸国的大道。史载永乐年间，陈诚、李暹(《明史》作李达)、傅安曾沿此路出使撒马儿汗和哈烈(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)等地，^⑪《西域行程记》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卷117佚名、《西域土地人物略》都对此路线记载甚详。明朝中后期，由于我国同西方经济往来改为水路，郑和下西洋，与西南各国联系，西北方面只是偶而通行。当时通往西域的道路因敦煌地区及其以西道路艰难，不易西行，改由经安西、哈密、吐鲁番再通往西域各地，不经过敦煌。清代初期通往西域的路线是：由长安经河西走廊到安西，再由安西所营的白墩子，红柳园到哈密，通往北庭、乌鲁木齐市、伊宁、伊犁及以西地区的一条大路。这条路亦不经过敦煌。到乾隆时曾一度改道，所改之路必须经过敦煌，可见，乾隆有重振敦煌的意图。史载：乾隆二十八年(1764年)改设新路，自安西踏实芦苇沟，转由敦煌所营的甜水井，圪塔井至敦煌。再由敦煌黄墩子、呵呵石子、窰子、青墩峡转至安西所营的红柳园接连大路至哈密。^⑫这条路线由于绕道太多，通行时间不长就被废而不用。后来又改回原大路。由明清时期通往西域的交通路线可以看出，敦煌已失去了它以往在丝绸之路上总枢纽的特殊地位。当然这与明清时期敦煌的地理条件较差很有关系。

三、明清时期敦煌莫高窟的缮修与开凿

莫高窟(千佛洞)距敦煌东南四十里，位置在鸣沙山西尽头，隔着大泉，遥对三危山。它建于秦建元二年(公元366年)^⑬从它凿建起，历代都很重视。元代以后，千佛洞渐就凋残，少数民族的频繁侵扰，影响了千佛洞的艺术，但不管怎样，敦煌仍然保持着礼佛的习俗，元世祖时马可波罗东来经过沙州，说沙州人崇拜偶像教^⑭其实这种情形一直到现在还保留了一部分。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日(活佛节)敦煌人倾城倾乡地到千佛洞来礼拜。明代人们礼佛的习俗，四月八日户民为活佛之会，香火称盛。^⑮明代中后期，由于实行退守关内的保守政策，敦煌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，莫高窟也只好无声无息地躺卧在西北边陲的沙漠中。正德十一年(1516年)，明政府把瓜、沙二州人民全部内迁，而以河西之地为重要的军屯区。据唐景绅《明代河西的军屯》，河西军屯人数为四万，屯田四万五千九十三顷三十五亩。明代中叶以后，屯田军人在敦煌落户，他们仅为生活奔波，根本无暇顾及莫高窟。吐鲁番统治敦煌时期(1516—1715年)敦煌仍然处于奴隶

制社会形态,吐鲁番人崇信密教,对佛教极为反感。因此,莫高窟中明代的作品很少,仅有一则游人题记和一个白衣观音洞是明代所作。题记如下:

陕西行……了……等……了处蕃达……了……安妥□降……了……感佛威力蕃夷安妥人
民□□。成化十五年六月。

从这个内容断续、字迹模糊不清的题记中可以看出:游人很可能是内地人,姓名和地址未留,题记地点是在第五窟的西壁上,时间为明宪宗成化十五年(1479年)。据前面所讲的敦煌沿革来看,这一年正好是朝廷准许只克在沙州筑城立罕东左卫,以抗衡吐鲁番之时,那时候,敦煌地区相对来说较安定。题记中的“蕃夷安妥”正是指游人看到的情况。因此他把这一切归功于膜高窟中的佛法力量,且表现出一种对佛法的顶礼膜拜和对佛法伟大的赞美。

至于莫高窟中的白衣观音洞,以风格看不象其它朝代所为,似是明代作品。^⑩但它是哪年修凿,史书无记载,没有办法推断,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考究。

由于明代中期以后,“敦煌而事酒泉,”^⑪使得嘉峪关以外,“皆为羸靡之地”^⑫,无人管理,因此,敦煌莫高窟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据《敦煌县志》载:明代莫高窟“佛像屡遭毁坏,龕亦为沙所埋。”就连莫高窟附近的佛寺也难逃劫数。“(鸣沙山)……东麓有座雷音寺,倚山为守,山错沙石坚凝似铁,凿龕以千计。”^⑬此寺在旧沙州卫城南三十里处“创始年未详,有断碣云:唐某年重修……明时,回人蹂躏,佛像毁坏。”^⑭敦煌到处是“问禅无僧侣,稽首冷香烟,字落残碑在,丛深蔓草缠”^⑮的荒刹景象。

清朝,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花了六十年时间,平定了准噶尔叛乱,稳定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秩序,重新营建西北边陲。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清政府改置敦煌县以后,地方官员才开始注意到莫高窟,做过一些清除窟内积沙的工作。嘉庆道光年间,主要是对莫高窟中的佛像进行缮修和重新塑像。也就是在此时,莫高窟又燃起了香火。

清代新建窟有二,其中在榆林窟中新凿建了九个洞,第六洞中有重修千佛洞的扁额。叙文曰:“至嘉庆年间,安置住持供养香火,……因举经理会首魏宗文、李兴隆、王广悟修补茸之余,绘塑重新,金身全美,尘土尽去,妙相焕如。”可以看出,清朝莫高窟的塑像多为此时建造。乾隆时期也凿过洞,从风格看显然是清代的作风,并且还有清人的题词“乱山丛磧隐流泉,四顾云岩有洞天。野馆阴岭连佛屋,禅关春瘴起蛟渊。千秋石碣谁读,一代琳宫尚记年,亿万法身归漠汉,如向人世说桑田。”^⑯

莫高窟在清代除了很少凿窟外,大多数是对窟中的塑像进行缮修和装銮。当时进行过缮修和装銮的窟大致有二百一十六个。法人伯希和说“敦煌千佛洞,其洞窟约五百所,^⑰仅凿一穴以居佛像者其数甚多,有若干窟绝无藻饰,且有若干窟……其数不少……经近代人修茸……”^⑱。伯氏所提的近代人指的就是清人。清人的修缮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讲不如原来作品,甚至可以说,此间的修缮水平很差。尤其是清末的下寺道人王圆箓请人所绘制的壁画,可以说是对敦煌洞室宝贵遗产的摧残,使许多优秀作品在保存了几百年后,没有因毁坏,却因缮修而面目全非。

清代不但对莫高窟进行了缮修,而且人们对于千佛洞中的某些造型进行了改变。雍正年间,千佛洞中有些窟被改成娘娘殿,出现了几个含有我国民间风味的彩塑。此较典型的是454窟,窟中送子娘娘的主角,被打扮得粉面小脚与清代中原一般庙宇中的造型大致相同,直到现在,民间还流传有送子娘娘的传说。^⑲除此之外,在敦煌莫高窟中保存了不少道教的东西。本世纪初,在莫高窟千佛洞第十七号窟中发现了四万余件道经抄本,这许多抄本通过王道士介绍给全世界,因为他当时为修复莫高窟而住于第十七号窟中^⑳。敦煌当时有几座道观,其中位于县城

西三里的“西方观”就是建于雍正八年(1731年)。清代莫高窟中有道士和道观,说明当时道教势力很大,这从窟中改佛为道的重妆,就可以看出一、二。

清代莫高窟中无壁塑、彩塑,只有圆壁。其内容只是金刚、灵官、送子娘娘及鬼神等,而没有象前几代那样的飞天、比丘、天王、菩萨、供养人、佛、地神等多种造型。这种内容造型的变化,与清代时期敦煌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艺术衰落有很大关系。

清代,敦煌莫高窟也遭到破坏,对明代来说,只是程度较轻一些。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(1831—1834年),敦煌县令许乃普曾到莫高窟并留下了《千佛岩歌》。他在其序文中记述了敦煌当时的情况:“敦煌城南四十四里,有千佛岩、雷音寺。三危峙其北,山错沙石坚若铁,岩下凿龕千百,其中圯者数百,掩沙者数百,危楼已断不能登者数百,而佛像如新,壁画斑斓者,尚不可数计。”再现了清时莫高窟的状况。同治年间,敦煌回民白彦虎起义时,尽毁莫高窟走廊,上层诸窟遂不可登,这倒使莫高窟因祸得福,后来躲过了清末民国初年混乱时的破坏。光绪宣统间,造士王圆箴盗卖遗书后,大量修建,为贯通各窟,招工将窟内壁凿穿,他自以为是功德,实际造成许多洞窟的重大破坏。

明清时期的敦煌莫高窟,随着我国封建社会步入晚期,也面临着毁灭的厄运,和我们整个国家民族一样,在度日如年中渴望着拯救解放。

注:

①本文所谓的明清时期是指明太祖洪武元年(公元1368年)——清光绪二十六年(公元1900年)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为止。

②《甘肃新通志》卷八《舆地志·形胜》。

③秦川《明政府开发西北决策的若干启示》载人大复印资料《明清史》1991.8。

④《明史·西域传》。以下引文没有注出处者均源于《明史·西域传》。

⑤(日)和田清《明代蒙古史论集》上册。

⑥《敦煌县志》卷二《地理志·沿革》。

⑦《敦煌县志》卷七《古迹》。

⑧《敦煌县志》卷七《敦煌废郡》。

⑨《甘肃通志》卷十四《建置·城池·敦煌县》。

⑩⑪《甘肃通志》卷十四《建置·城池》。“国朝汪隆城工告成四首。”

⑫《甘肃古代史》

⑬《敦煌县志》卷七

⑭今日党河水库已移向上流几十里,说明水势减弱;清代时党河有十数渠分流,比现在的支渠还多,可见水势较大。

⑮《敦煌县志》卷六“党水一《敦煌八景》”二苏履吉。

⑯《甘肃通志》卷十四《建置·城池》“汪隆又登沙州城楼出郊看千佛洞墩台二首。”

⑰宁欣《唐代敦煌地区农业水利问题初探》载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》

⑱《敦煌县志》卷六《艺文》“古城晚眺”“敦煌八景”三,苏

履吉。

⑲龚自珍《西域置行省议》

⑳《甘肃通志》卷十四《建置·城池》、汪隆又登沙州城楼出郊看千佛洞墩台二首。”

㉑(日)和田清《明代蒙古史论集》。

㉒杨正泰《明代国内交通路线初探》“载《明清史》1991.2。

㉓《敦煌县志》卷七《杂类·(外境)》

㉔据徐松《西域水道记》中说,清乾隆癸卯年(1783年)敦煌的一位哲士赵吉曾在峭壁里掘到截断碑有文云:“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傅立”此碑旋为沙所埋。

㉕《马可波罗游记》

㉖水天明《敦煌访古忆记》载《兰州大学学报》1980.2

㉗《敦煌县志》卷七《杂类·古迹》

㉘苏莹辉《敦煌的壁画艺术》载《敦煌论集》。

㉙⑩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六十四,陕西十二 P2719

⑪徐松《西域水道记》。

⑫⑬《甘肃通志》卷三十《祠祀志·寺观》。

⑭《甘肃通志》卷三十《祠祀志·寺观》“姚培和题千佛洞。”;《敦煌县志》卷六《艺文》“千佛洞”姚培和

⑮伯氏所谓五百余所,是指所有洞窟而言并非说有塑像、壁画者。

⑯伯希和《西域探险报告书》。

⑰胡戟《敦煌述略》1984。

⑱(日)福进康顺、山崎宏、木村莫一、酒井忠夫监修《道教》第三卷。

作者单位:西安联大师范历史系